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

# WORLD MAKING

# 塑造世界

[美] 戴维·米尔恩 —— 著  
魏金玲 —— 译

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

David Milne

马汉 · 伍德罗·威尔逊 · 查尔斯·彼得德 · 瓦尔特·李普曼 · 乔治·凯南 · 保罗·尼采 · 亨利·基辛格 · 保罗·沃尔福威茨

新华出版社

# 塑造世界

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

「美」戴维·米尔恩 | 著

魏金玲 | 译

新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塑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 / (美) 戴维·米尔恩著；魏玲金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9

书名原文：World ma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

ISBN 978-7-5166-3452-3

I. ①塑… II. ①戴… ②魏…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261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16-6096

World Making: The Art and Science of American Diplomacy

By David Milne

Copyright © 2015 by David Miln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塑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

作 者：(美) 戴维·米尔恩

译 者：魏玲金

责任编辑：唐波勇

封面设计：臻美书装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经 销：新华书店、新华出版社天猫旗舰店、京东旗舰店及各大网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臻美书装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8

字 数：510千字

版 次：2018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1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452-3

定 价：78.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 19 世纪末至今美国外交思想史的重要著作，作者全面回顾了塑造美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的 8 位人物的生平与思想，包括马汉、伍德罗·威尔逊、查尔斯·彼尔德、瓦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最后结束于奥巴马时代的实用主义思潮的复兴。本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迄今最好的一部美国外交思想史著作。



新华学术 · 思享者

## 新华学术系列图书：

- 《思维的方式》[英]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 著
- 《多元文化主义的终结》[美]劳伦斯·哈里森 著
- 《想透彻：当代哲学导论》[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 著
- 《法国人是如何思维的》[英]苏迪·哈扎里辛格 著
- 《稻草狗：进步只是一个神话》[英]约翰·格雷 著
- 《木偶的灵魂：自由只是一种错觉》[英]约翰·格雷 著
- 《动物的沉默：人类优越论是一种偏见》[英]约翰·格雷 著
- 《反利维坦：政府权力与自由社会》[美]罗伯特·希格斯 著
- 《道德之弧：科学和理性如何将人类引向真理、公正与自由》[美]迈克尔·舍默 著
- 《民主的反讽：美国精英政治是如何运作的》（第15版）[美]托马斯·戴伊 著
- 《权力精英》[美]C·赖特·米尔斯 著
- 《政府为什么会失败》[美]兰迪·T·西蒙斯 著
- 《幸福乌托邦：科学如何测量和控制人们的快乐》[美]威廉·戴维斯 著
- 《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美]塞缪尔·亨廷顿 主编
- 《电影院里的哲学课》[英]克里斯托弗·法尔宗 著
- 《哲学能做什么》[美]加里·古廷 著
- 《非常识：最聪明哲学家们的最奇怪思想》[美]安德鲁·佩辛 著
- 《思想者心灵简史：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美]詹姆斯·米勒 著
- 《道德哲学十一讲》[英]艾里克斯·弗罗伊弗 著
- 《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问题》[美]菲尔·沃什伯恩 著
- 《我们如何思维》[美]约翰·杜威 著
- 《论人的本性》[美]爱德华·O·威尔逊 著
- 《对权威的服从：一次逼近人性真相的心理学实验》[美]斯坦利·米尔格拉姆 著

## 前言

1949年9月，一架WB-29轰炸机从日本冲绳起飞，向北飞往堪察加半岛，之后盘旋在苏联的东北部上空，如同一条彗尾。这架轰炸机经过改装，用来执行监视任务，并携带有过滤器，用来监察大气中的异常现象。在这架飞机肆意挑衅苏联领空的过程中，过滤器检测到了异常高含量的放射物。位于海上的海军科学家也确认，雨水中同样也出现了放射性沉淀物。对此，只有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苏联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

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的大卫·利连索尔将此事告知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杜鲁门获知此消息后非常震惊——苏联竟能如此早地测试一台原子装置——他几乎难以相信。他询问利连索尔是否确定放射物来自核武器而不是反应堆故障。杜鲁门最终相信了利连索尔的话，原子源的确被制成了武器。此时，他需要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是否下令开发氢弹，作为对此事的回应。氢弹是一种核聚变装置而非核裂变装置，拥有比后者更为强大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从理论上讲是无限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注意到，氢弹之于原子弹，就如同“原子弹之于弓箭”。<sup>1</sup>他意识到了氢弹划时代的本质。是否下令开发氢弹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军事对策，同时它还是一个哲学命题。为实现一个强有力的决策流程，杜鲁门成立了一个由利连索尔、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三人组成的委员会，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为总统提供一个最终建议。约翰逊自然建议开发氢弹，而利连索尔反对开发，因此决定权似乎握在了艾奇逊的手中。关于“热核是否应当参与美国未来的军事”这一问题，艾奇逊征询了他两名最卓越的战略思想家的意见：政策规划署署长乔治·凯南及副署长保罗·尼采。

审慎而保守的凯南以其惯常的方式着手此项事务。他回到办公室阅读了大量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并花费了大量精力去思考和写作。解决这样一个具有巨大道德和战略维度的问题，并有可能面临最糟糕的情形，包括人类生命在地球上消失。凯南很快便感到自己身心俱疲。当时，他的妻子安娜莉丝刚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不久。在完成初稿之后，凯南曾对艾奇逊开玩笑说道，他“前天甚至忍不住想要进入宝宝的房间

跟宝宝说‘快起床，你今天还得去工作。我要钻进婴儿床了。’”<sup>2</sup> 凯南写出了一篇长达79页的文章，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与哲学理论，并最终建议不要开发这个可怕的武器。从道德层面上讲，这种核聚变装置是令人唾弃的，制定出完美的“原子战略”这一整体观念是凶暴残忍的——因为它有可能导致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因此，在这种独特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是最佳的解决方式。凯南试图以优雅的散文和广博的文学典故表达其观点，其中还引用了莎士比亚作品《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文字：

欲望，就像一只无所不在的狼，  
一旦拥有决心和权力，  
便会更加肆意妄为，  
追逐一切猎物，  
最终吞噬自我。<sup>3</sup>

如果说一场采用常规武器的战争可能会产生常规的结果——“投降与屈服”——凯南认为“拥有巨大破坏力的武器则是不具备这种品质的。这些武器会越过西方文明的边界，倒退到与亚洲游牧民族类似的战争概念……它们意味着，人类可以是，实际上也的确是其自身最可怕的敌人。”总结来讲，凯南引用了保罗在《圣经》中的句子，在呼吁由美国价值观来引导决策流程之前，“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所预言的也有限”；“在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只有一件事能使一个国家体现其坚定而可靠的价值观；那就是，其政策的出发点务必要尽可能地接近由其传统与本质所决定的原则。”<sup>4</sup>

另一位保罗·尼采的行事方式则截然不同。他曾经是华尔街的银行家，擅长数学和演绎逻辑，他是一名官僚主义拳击手，知道何时掐住对手的喉咙，他还是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对国际经济事务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由于他的这些特质，特别是他出色的定量分析能力，使得凯南于1947年向艾奇逊申请将尼采纳入政策规划署中。但是艾奇逊拒绝了凯南的这一请求，认为凯南应当雇佣一名“有见地的思想家”，而不是一名“华尔街的操盘手”——这是一种典型的艾奇逊式尖刻的贬损。<sup>5</sup> 但是，在此后的几年里，艾奇逊却逐渐改变了对尼采的看法。1949年年中，凯南决定休假一段时间，因此他再次询问艾奇逊能否任命尼采担任副署长，待自己离开后接替其的职务。这一次，国务卿同意了，带着绝对的真诚。尼采是一名坚决的反苏联主义者。凯南认为“可以同莫斯科就德国统一事宜达成协议”，对此尼采并不赞同。同时，尼采坚定地认为，应当尽可能地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借助武力，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平。尼采的方法主要以数据和科学为依据，他对于氢弹问题的回应体现出了与凯南不同的世界观和优先考虑事项。

起初，尼采力图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核聚变。他曾连续多天与J·罗伯特·奥本海默(后

成为凯南的朋友)、爱德华·泰勒会面。罗伯特·奥本海默对于热核武器的开发持怀疑态度，而爱德华·泰勒却强烈倡导开发热核武器。奥本海默曾在原子弹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认为在战时状态下，开发这些武器是正当的行为，但是他并不想参与研发一个更加可怕的武器。他个人认为，从道德立场出发，美国应当拒绝开发核武器，并希望苏联能够效仿。但是奥本海默也知道，尼采不可能因为他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想法而动摇，因此转而竭力说服尼采：制造氢弹的科学其实是一种科学幻想。奥本海默发现，尽管从技术层面而言，制造和引爆氢弹具有可行性，但如果想要移动这个必然非常庞大的装置，绝非一件可以轻易完成的事情。他告诉尼采，一架飞机无法携带这个笨重的武器，它需要的可能是一辆“牛车”。这意味着，从战术上讲，这个热核弹是毫无作用的。尼采回忆说，“总之，（奥本海默）认为，如果任何国家都不研发此类武器，这个世界会更加美好。”<sup>6</sup> 尼采发现自己的说辞无法令奥本海默信服后，写道，“我们完全没有考虑他的那些建议，因为他的建议似乎都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提出的。”<sup>7</sup> 奥本海默没有说出制造氢弹的科学的实情，因为他惧怕这会释放出一个巨大的魔鬼。

爱德华·泰勒更擅推销言辞，因为他相信产品既已出现，自有其必然性。尼采表示，“泰勒有着清晰、强大的头脑，即使对方并不是一名专业的物理学家，他也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对方理解。他走到黑板处，向我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sup>8</sup> 尼采对这一话题和他的这个交谈对象越来越有兴趣，最后与泰勒探讨了两个多小时的物理学。谈话结束时，尼采已深信热核弹具有可行性，而奥本海默关于热核弹无法移动的警告根本是无稽之谈。尼采的猜测是正确的，奥本海默的建议已经完全被他的政治性所蒙蔽。泰勒则在论辩时专注于问题并令人信服。对于他们正在讨论的这项事业，他并不会产生道德上的疑虑。作为一名犹太匈牙利移民，泰勒蔑视苏联以及其错误的意识形态。他认为毫无疑问，美国应该控制自己不要与这种政权进行竞争。当然，同样是政治性塑造了泰勒所提出的建议。在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泰勒依旧坚持政治右倾。例如1954年，泰勒向国会证明，奥本海默的和平主义倾向已经将他自身置于“危险分子”的处境。<sup>9</sup>

凯南依然将自己隔离在办公室中，从莎士比亚的文字中寻找合适的语言为自己的言论提供支持。而尼采则加入了国务院内部的原子工作组。对于那些氢弹怀疑论者——这些人担心氢弹的开发资金会从服务预算中抽取，尼采提出了一些为药片添加糖衣的方式，例如为热核武器的开发设置战略性复核，用于补充和资助常规军力不足的状况。当尼采收到凯南的论文草稿时，他在边缘空白处潦草地写了一些表达异议的批注：“不行！”，“错误地理解了我们的意图”，“禁止”等。在对凯南的正式回复中，尼采提到，拒绝开发热核武器、致使苏联获得战术优势这种行为是愚蠢和不计后果的鲁莽的。<sup>10</sup> 尼采建议美国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开发氢弹。任何道德考虑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的敌人没有相同的道德信仰，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绝无信仰可言。

艾奇逊非常欣赏尼采执行任务的专业方式，并认为他的建议是可取的。尼采描绘出了其中的科学，调查了形势，准备了官样文章，安抚了批评者，并果断地反驳了凯南。与此相反，艾奇逊对凯南的方法和建议只有轻蔑：凯南的方法没有超过他的主要武器——他的文采——的发挥，而他的文采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国务卿依然记得凯南告诉他，美国人应当“即使死亡也不能成为像制造这种武器这样的邪恶行为中的一员”。艾奇逊厉声回答说，“如果这就是你的观点，那你应该离开驻外事务处，到其他地方去传播你的贵格会福音。但请不要在国务院内说教。”<sup>11</sup>现在，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只是走一个过场了。

决策甚至不能说是多数票决。在1950年1月31日的一场会议上，杜鲁门仅问了艾奇逊、利连索尔和约翰逊一个问题：“俄国人有能力做这件事吗？”三人组一致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总统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开始干吧。”据一名沮丧的热核弹反对者回忆，那种感觉就像是“你在阻止一台压路机通过。”<sup>12</sup>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证实了尼采和杜鲁门的观点，他们别无选择，这是唯一能够做出的决定。总统在众议院的台阶上宣布决议后的第二天，杜鲁门得知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移民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实际上是一名苏联间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J.埃德加·胡佛认为这一真相“将更加坚定总统关于（氢弹）的决议，（同时），也会使得福克斯的很多同行更加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言论。”在得知福克斯的间谍身份后，利连索尔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房顶塌陷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灾难，对于人类而言，今天令人如此悲伤。”<sup>13</sup>

\*

从多个层面而言，尼采与凯南之间就所谓“超级炸弹”的分歧是非常有趣的。首先，凯南抵制氢弹的行为并非出于对苏联能力和意图的客观评价，而是出于道德、本能和感化考虑。很明显的一点是，凯南通常被认为是外交战略中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在一个无政府世界体系中，所有国家都在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优势；而这一次，他却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建议。<sup>14</sup>近代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拒绝开发一个能带来更强杀伤力的武器系统。在科技与资源允许时，英国人在12世纪研发出长弓；瑞典人在17世纪研发出榴弹炮；德国研发出V1和V2火箭推进式导弹——所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研发出的。对于一个如此深谙历史的人来说，凯南反对研发氢弹的行为很显然不符合历史趋势的，令人惊诧。它基于威尔逊式假设——美国拒绝研发热核弹，并对于一个国际组织抱有信心，将说服苏联也这样做，其主要作用的是美国克制自己不开发热核弹这一行为的道德水平。毫无以为，这个建议很有创意，如果成功，历史的法则就会被改写，因为这样的“妖怪”不会被轻易地装回到“神灯”里面。

然而，我们都了解，凯南的建议极具风险。在一月份杜鲁门发布决议前三个月，斯大林已经发布命令，要求苏联开发氢弹。1952年，美国试验了第一枚氢弹，短短一年之

后，苏联也进行了氢弹试验，这再次远超美国的预期。如果执行了凯南的建议，苏联可能会成为唯一一个拥有热核武器的国家，这将是非常真实的“导弹差距”，有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领导苏联氢弹开发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后来成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曾提到，他的政治领导人不会为美国的克制行为所动：“无论美国采取什么行动去延缓或永久取消热核武器的研发，都会被判定为狡猾、欺诈性行为，或者是其愚蠢和懦弱的体现。无论是哪种情况，苏联的反应都是明确的——绝不能中了美国的圈套，要迅速行动，充分利用敌人的愚蠢。”<sup>15</sup>

凯南的建议本是出于善意，但却非常危险；尼采的建议没有受到太多情感影响，提议将违反直觉的推断作为“更加安全”的行动路线。凯南认为热核世界无法容忍，美国不应参与到这种世界的创建之中。他之所以提出此建议，是因为他拥有坚定、绝对的道德原则。在了解到这种武器的性质后，人们很容易得出这种观点。但是尼采看到的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在这种罕见的情形中他能够比凯南更加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当然，这次争论的含义不止于此。关于氢弹的争论还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常常被最适当地认为是一部思想史。<sup>16</sup>迥异的哲学观、学科上的偏好、宗教情感以及人生经历等都会不可避免地塑造出外交政策制定者所提出建议的结构和特性。凯南的文明悲观情绪、宗教信仰以及广泛的道德哲学阅读，1949年访问他热爱的汉堡时所引发的恐惧——“那无边的废墟淹没了我”，以及他确信氢弹会带来关乎存亡的威胁，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形成了与凯南的一贯态度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他一直对威尔逊式超国家机构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此类机构无法取得有意义的结果。<sup>17</sup>因而，这是一种机灵而情绪化的反应。

尼采不如凯南那般博学和好沉思。但是他了解，1949年9月——此时毛泽东取得了中国内战的胜利，仅仅几个月前苏联解除了对柏林的封锁——不是一个可以仅凭道德理念做出重大决策的时候。尼采从他的思维过程中剔除了情感因素，因为他认为情势需要如此。凯南和尼采都对这一困境做了思想性探究——凯南从道德标准方面进行思索，而尼采从科学和战略平衡方面进行思索——最终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都相信自己的建议能够更好地拯救世界。

纵观美国历史，外交决策的风险并不总是如此之高，也并不总是如此富有刺激、错综复杂，但有一条基本原则却始终适用：没有一个概念框架，就很难理解其外交政策。在形成决策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分界线：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道德标准与技术水平；情绪性与工具理性；理论与直觉；实用主义与一元论。<sup>18</sup>凯南与尼采之间的争论不同程度地涵盖了上述所有类别。这样的二元结构可能有所助益，因为它们把握住了在政策制定中不可抗拒的基本势力。但我注意到，有时它们也产生误导作用，正如沃尔特·惠特曼在诗集《草叶集》中所述，人“数量庞大”，“群体众多”。

本书是一部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史，集中介绍美国外交观点、观点的提出者以及观点提出时所处的情境，并分析了这些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笔者意在确定和阐释 19 世纪末以来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争议性观点，并对其加以评论。19 世纪末，凭借在美西战争中的胜利，美国宣称自己真正为一个强国。笔者试图通过叙述 9 名智力超群者的历史经历，来达到上述目的。这 9 名人物包括：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伍德罗·威尔逊、查尔斯·比尔德、沃尔特·李普曼、乔治·凯南、保罗·尼采、亨利·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贝拉克·奥巴马。上述人物关于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观点和分歧构成了美国自内战（马汉曾参与美国内战）至今的外交关系史。尽管每一章都着重阐述一名人物，但文中采用了大量的对话体，而非传记体。每一名人物都有意识地参与到了塑造世界的过程之中，他们制定战略，力图利用国家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或通过一次国内重整来实现国家的再次发展——来“塑造”一个能够使美国在其中繁荣发展的世界。<sup>19</sup>

笔者意识到，在使用传记式框架撰写一本书时，一些选择看上去会比较随意和武断。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以及贝拉克·奥巴马等人作为个体都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外交政策塑造者。毕竟，总统与高层政策顾问不太可能引起对本书选取人物的标准的怀疑。诺贝尔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及其搭档阿摩司·特沃斯基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可得性启发法”，应用于本书中，意即，如果一个名字易于辨别，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常重要。<sup>20</sup>但是，阿尔弗雷德·马汉、查尔斯·比尔德和沃尔特·李普曼并不是那么著名的人物，没有扮演直接的政策制定角色，因而需要进行更多的说明。

马汉的观点在今天依然适用。他的观点具有永恒的特质，如同修昔底德、孙子、马基雅维利、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作为《海权论》（*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这部开创新著作的作者，马汉在战争、贸易以及海权的极端重要性等重大问题上拥有卓越的见识，以至于他的观点可直接作为决策来使用。在第一章，我本可以讨论西奥多·罗斯福、亨利·卡伯特·洛奇或国务卿海约翰等人，他们均在 19 世纪末展现出了强有力、有影响力的外交卓识。但是，就覆盖范围和原创性而言，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任何一个贡献都无法与马汉相匹敌。受到“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启发，马汉提出了史无前例的“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一个无须正式吞并大量领土的经济文化帝国。他的著作和文章激发了人们对于 19 世纪 90 年代期间及以后美国扩张的讨论。

直到伍德罗·威尔逊开始抵制马汉世界观中的物质主义和非道德性——总统先生认为这种对英国实践的狭隘仿效背叛了美国的承诺——美国的外交政策才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思路。1913 年，威尔逊出任总统，此时他的外交政策理念尚处于早期阶段。1917 年，他不得不对德宣战，这简直是国际事务领域的一场革命。关于如何在德国战败后将其纳

入国际体系之中，威尔逊试图达成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和平”，通过广泛的合法性来拒绝惩罚，确保战后稳定。更宽泛地说，威尔逊认为建立一个国际联盟是避免灾难性战争再次发生的唯一可靠的方式。在巴黎和会上，总统表示，希望促成“科学的和平”。<sup>21</sup>

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愿望在自己祖国的土壤上枯萎了，因为美国又回到了其长期存在的传统上，即在一个舒适的距离虎视眈眈地望着欧洲强国。想要研究美国外交政策，那么你必须了解发生上述转变的原因，并深入探索孤立主义的真正历史内涵而非众所周知的含义。<sup>22</sup>因此，本书接下来探讨了历史学家、政治学者查尔斯·比尔德。比尔德认为，马汉和威尔逊是鲁莽的干涉主义者——尽管超道德范畴的马汉的罪责更大，但他们都被自由贸易为美国带来的虚幻利益所驱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尔德成为“大陆美国主义(Continental Americanism)”（这是孤立主义的自给自足版本）最明确和忠实的提倡者。

在美国外交关系史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应当公开放弃参与会造成欧洲危机的活动，例如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奈、爱达荷州参议员威廉·博拉、飞行员兼美国第一委员会会长查尔斯·林德伯格以及电台牧师、煽动家查尔斯·考哥林等。但是没有人曾持续、连贯地探索过美国会如何从全球冲突和贸易模式中摆脱出来。（另外，林德伯格和考哥林受到原始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看待问题粗陋浅显。）比尔德在三四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整顿能够使美国（所有社会阶层）更加健康和成功，并且成为其他国家的指路明灯。

当然，比尔德的“大陆美国主义”以及其他孤立主义者不那么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没有等来属于自己的一天。反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带领美国迈向了激进式全球领导的时代——这也直接使得美国成为如今全球关键的角色。然而，虽然罗斯福的任期对美国外交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很难以某个重大战略或战略家来定义罗斯福或他的任期。总统本人并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凯南后来称罗斯福为“一个才疏学浅但极具勇气和魅力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评价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对总统的政治判断力进行客观评价。而在政治判断力方面，罗斯福要远胜于凯南。<sup>23</sup>罗斯福擅长即兴演讲，而且非常看重个人外交；他坚持着一些固定的原则，但界限比较模糊，据他解释，在必要的时候，要以大局为重。<sup>24</sup>罗斯福在1942年说道，“你知道，我是个骗子。我从不会让我的右手知道我的左手要做什么……我可能对欧洲有一个政策，对北美和南美又有一个完全相反的政策。我可能会反复无常，并且我也非常乐意去误导人们，去说一些谎言，只要能赢得战争。”<sup>25</sup>

在需要时，罗斯福会说谎，会利用一切有助于实现目标的想法。从1939年到1945年，最具原创性的外交政策理念都来自罗斯福政府外部。因此，笔者另起一章，讲述记者沃尔特·李普曼。李普曼是从卡尔文·柯立芝至林登·约翰逊期间美国最博学、最受爱戴、

最受信赖的新闻记者，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扮演多个角色。他为罗斯福拟定了一份关于为英国提供航材支援的极具说服力的论断，以至于一名来自《圣路易斯邮报-遣使报》的记者威胁要调查李普曼在“这个将美国卷入战争的阴谋”中所发挥的作用。<sup>26</sup>自1939年开始，李普曼就借助“今日与明日”辛迪加专栏提供了令人叹服的降服德国与日本战略理念。之后1943年，李普曼又出版了《美国外交政策：合众国之盾》（*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一书，该书畅销近50万册，并在《读者文摘》上连载。李普曼从马汉的观点中汲取灵感，批判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同时极力反驳了比尔德的孤立主义。相比于一名卓越的战略家，罗斯福更需要一名公众舆论塑造者。虽然李普曼与罗斯福并未蓄意合作，但两人的目标却愉快地重叠了。

凯南与李普曼有许多共同的观点，但两人首次有交集却是因为一次激烈的争执。李普曼认为延续美苏的强强联盟对于维持战后稳定至关重要。1946年，凯南指出这种观点太过天真。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职时，凯南向华盛顿发电报表示，他认为斯大林一定会牺牲美国的利益来扩张自己国家的实力，因此，必须抵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的内在驱动力来自民族主义、对容易被攻击的深层恐惧以及救世主似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封近6000单词的长电报是美国国务院历史上最著名的信函，它在华盛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年后，凯南以字母“X”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匿名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的文章。该文章详细阐述了“遏制”战略，并将苏联比喻为一个发条玩具，它会沿着一个特定的方向不停地走下去，除非有一个障碍挡住它的去路。很快，人们便发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凯南。大部分人都称赞他的观点，只有少部分表示了轻蔑。

李普曼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冷战》（*The Cold War*），“冷战”一词由此流行起来——来抨击凯南的“遏制”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战略性暴政”。由于无法在一些次重要性领域持续承担责任，长此以往，会将美国置于危险境地。凯南被李普曼的攻击深深刺痛，但他后来也开始赞同李普曼书中的大部分观点。凯南认为有远见的外交政策需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直觉力，但不知为何他竟然留下了一份模棱两可的文件，它很像一幅蓝图，似乎在等待着被人误解。凯南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所采取的关键战略——遏制——的主要作者，同时也是以“冷战”名义所作出的决策的最强有力的反对者之一。

凯南卸任后，尼采继任政策规划署署长一职。尼采发现，在他担任最高机密NSC-68（官方名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方案”）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只是在充实前任的观点。NSC-68是一份重要政策文件，由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签署生效，但凯南却非常不喜欢这份文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尼采都认为，通过结合心理学分析与系统分析，可准确地对苏联的能力（进而是其意图）进行评估，并与美国的军事能力相

比较，从而对苏联的攻击形成威慑。他将这种计算方式描述为“力量的消长”，并且他通常认为，苏联的力量要比公众所认知的更加强大。NSC-68认为苏联的主要目标是“彻底颠覆或暴力摧毁非苏维埃世界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并建议说美国对此的适当回应应该是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并结合反对“第三世界”共产主义的强烈意愿。<sup>27</sup>NSC-68完成后两个月，朝鲜侵入韩国，看来尼采被证明是正确的。

尼采在杜鲁门政府的最后几年发挥了中心作用。同时，他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也锋芒毕露，他谴责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允许苏联政府率先发展核军事与非核军事力量的行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利用尼采的“导弹式差距”概念给予尼克松毁灭性一击，NSC-68的逻辑也助推了肯尼迪与约翰逊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承诺“将付出一切代价……确保国家的生存与自由”，这正是NSC-68的要点。这些经过大肆扩展的外交政策特征为一些人提供了发展的空间，例如沃尔特·罗斯托。罗斯托在尼采时期发挥了影响力，是肯尼迪和约翰逊的一名得力顾问，同时也是笔者第一本书的议题。尼采对约翰逊意图将越南战争美国化的决定（这是李普曼和凯南的共同观点）有着极度矛盾的看法，但是，他的外交情绪无法从东南亚悲惨的战争中脱离出来。

亨利·基辛格认为美国不得不大踏步撤回尼采NSC-68文件所提倡的无法维持的承诺。在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以及之后担任国务卿期间，他始终鼓励对苏联采取缓和政策，减少美国的海外承诺，向地区性大国委派代表，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基辛格是一个两极化的人物：凯南称赞他所做出的努力，并建议他不要理会那些诽谤者；尼采痛恨他的世界观，并对他的爱国主义表示质疑。

与他人不同，基辛格提倡的外交政策价值观是“公信力”。他认为美军应当从越南撤离，但撤离方式应当能够向敌军和同盟军传达出美国依然是一股难以对抗的势力的讯息。通过轰炸和入侵柬埔寨以及轰炸北越（在平民伤亡的愧疚感方面比约翰逊政府要少一些。）达到了上述目的，同时美国军队也得以撤离，并将主要的防御责任留给了越南（南越）共和国陆军。除此以外，基辛格还针对智利的萨尔瓦德·阿连德民主选举政府发起了一场扰动战役，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在1971年的印巴战争中对孟加拉人犯下滔天罪行，并将美国的公信力牵强地应用在矿产资源丰富的安哥拉，对共产主义代言人展开血腥残忍的暴行。基辛格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拥有真正卓越的洞察力，同时又存在鲁莽的好战性；他取得了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成就，还对超道德世界观如何带来不道德结果做出了生动的阐释。

如同基辛格，保罗·沃尔福威茨也是一名犹太知识分子，拥有常春藤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但两人的相似性仅限于此。沃尔福威茨认为，从战略和道德上讲，基辛格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都是有缺陷的。沃尔福威茨赞同威尔逊总统的例外论，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是一股独特的道德、民主化力量，如果不这么认为，就是对国家理

想的背叛。在他服务卡特、里根和两位布什总统期间，沃尔福威茨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自己的国家有责任带领世界迈向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仅作为灯塔为他国照亮前路是远远不够的。

在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任职总统期间，沃尔福威茨强烈地反对在苏联解体后缩减国防开支，并指出（虽未被理睬）伊拉克的政权更迭本应随着萨达姆·侯赛因势力从科威特的撤离而退场。面对“9·11”事件突然而至的灾难，沃尔福威茨再次强硬地指出，消灭萨达姆政权势在必行。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沃尔福威茨效仿了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的勃勃雄心——同时也重蹈了威尔逊对马汉理论中历史先例的忽略行为——呼吁对中东进行全面变革。他认为“二战”后美国已经成功占领日本和德国，应当将这些中东社会转变为高性能的民主国家。沃尔福威茨没有提及那些国家建设运动的历史背景，而是颇有争议地扩展他的分析，质问：是什么在阻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变革？虽然需要付出高昂的人力与资金代价，这一行为最终可能平定的不仅仅是伊拉克，更是一个倔强、危险的地区。萨达姆消失了，伊拉克繁荣起来了，其邻国会不可避免地发展其代表制、责任制和经济竞争力。民主浪潮将会使各方获益。

沃尔福威茨的活动并没有取得一个好结果。2007年12月18日，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贝拉克·奥巴马说道，“我在伊拉克要做的，不仅仅是结束战争。我要竭力改变将我们卷入战争的思维。”<sup>28</sup> 在赢得总统选举之前，也就是在2002年芝加哥反战集会上发表的关于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演讲中，奥巴马便已确定了这种思维。奥巴马将针对伊拉克（萨达姆领导下）的战争行为斥为一场“愚蠢的战争。一场轻率的战争。一场基于激情而非理性、基于政治而非原则的战争……”奥巴马说道，“我反对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愤世嫉俗的尝试，以及政府内一些业余的、周末战士（weekend warrior，指周末参加劳动或体育锻炼的人——译注）强塞给我们的、纯属个人意识形态的空想，而不考虑我们所承担的艰辛以及所付出的生命代价。”<sup>29</sup>

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中随处可见其对意识形态的憎恶。他反对拘泥于一个固定的外交政策原则，如此看来，他很难给世人留下一个总统式外交政策“信条”——除非没有信条也算作一种信条。2011年，针对干预利比亚事宜，奥巴马曾拒绝向国会寻求建议，但却在2013年针对叙利亚事宜向国会进行咨询。2009年，奥巴马下令向阿富汗增兵——在今天看来，他似乎认为该决策是他最重大的一次外交政策失误——而后又迅速撤出，避免了进一步的代价。关于化学武器的使用，奥巴马对叙利亚划了一条红线。在阿萨德越过这条线时，他邀请国会商议如何应对。之后，又在应付弗拉基米尔·普京时放弃了主导的角色。奥巴马在接受ABC新闻采访时说，“华盛顿的人们喜欢对你的行事风格进行打分，采取正确的政策，是我更为在意的事情。”<sup>30</sup> 不同于本书所讲述的所有其他人，奥巴马认为外交政策并非一门完美无缺的艺术，一致性本身也不是一种美德。总统似乎

很赞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观点，“愚蠢的一致性是没有脑子的鬼怪，政治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是绝不会喜欢它的。”

\*

我们很难使用国际关系学界常用的常规术语对这9名人物进行分类。本书挑战了人们通常认为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一划分方法，认为它是对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主要区分的一种不完美表述。显然，运用这一划分法来探究美国外交，我们也能获得洞见。但是，这种分析视角已经变得有点司空见惯了。因此，我认为，另一种二元视角——艺术与科学，能够揭示出美国与世界互动中的一些不同内容。

本书所叙述的人物在处理外交政策事务时所采用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有着鲜明的对比，他们接受的教育以及后来的学科偏好都相差甚大。例如，马汉、凯南与基辛格主要从历史、哲学与文学中借鉴思路，但这些学科往往给人一种悲剧感和谨慎感，并且容易沉浸在已知的历史先例中难以自拔。而其他人士，包括威尔逊、尼采和沃尔福威茨，都是接受了社会科学的训练，比如政治科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后来蓬勃发展的国际关系学科，因而他们更倾向于视世界为“可塑造的”，并能够发现和运用一些恰当的模式和理论。拥有这种观点的人通常能够超越历史，做从未尝试过的事情，而不是在已知的历史界限内行动。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便是如此。同样的，沃尔福威茨在面对“9·11”事件之后的局势时也是如此。他们两人都认为应当重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的大部分）来满足美国的利益，从长远而言这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方式，而不是让美国擦亮双眼去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并且根据所见到的事态去采取行动。或者如同乔治·沃克·布什（小布什）在其第二次就职演说所断言的，“自由能否在我们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而在全世界传播自由是我们的世界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所在。”<sup>31</sup> 拥有这种情感的世界塑造者们通常会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认为历史正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以至于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极为坚定和坚持。而那些声称已经看到世界终点的人，会过分相信自己所提出建议的质量，并且不愿承认其设想存在错误；只有在执行后，他们才会看清事实。

相反，那些视外交政策为一门艺术的人认为，世界不能被当作实验室来看待，历史进程不得而知，政策制定者只能依赖直觉和创造力来制定政策。政策制定者的建议所针对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而非可能存在的世界。历史先例非常重要，依据抽象理论来制定政策太过鲁莽。外交政策艺术家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尽其所能应对这个不以个别国家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无论那些国家多么强大。他们并不试图创造全新、系统的知识；而是利用他们的艺术性增进美国的利益，保护其疆界，防止这个世界的千百万种破坏方式。如果企图更多，会招来报应。